

---

---

# 高质量发展阶段如何保持充分的社会性流动

蔡 昉

( 中国社会科学院 北京 100732)

摘要: 从经济社会的维度讨论人口变化即社会性流动发现, 得益于经济增长、产业变化和教育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流动性明显增强。而在人口转变和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后, 社会性流动类型发生变化。应对由此带来的挑战, 需要破解新阶段下社会性流动潜在具有的零和博弈性质, 保持社会流动渠道畅通。这关系着能否在中等偏上收入阶段乃至跨过高收入门槛后, 收入分配状况持续得到改善, 以及改革开放发展成果继续得到充分分享, 从而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基于对高质量发展与社会性流动之间关系的分析, 立足于破解效率与公平“取舍”难题, 保持保障民生尽力而为和量力而行的动态平衡, 从加大再分配力度、推进教育深化和均等化及推动体制机制改革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 高质量发展; 社会性流动; 再分配

中图分类号: F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 - 7685( 2020) 01 - 0001 - 08

DOI: 10. 16528/j. cnki. 22 - 1054/f. 202001001

##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创造了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持续安全稳定两大“奇迹”, 而两大“奇迹”的实现密不可分。特别是社会能够长期保持稳定, 正是由于经济发展成果能够为全体人民共享, 使整个社会保持充分的流动性, 形成通过努力工作和积极创业改善生活、勤劳致富的局面。中国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面临着转变发展方式和产业优化升级的艰巨任务, 如何在此发展阶段继续保持充分的社会性流动, 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改革开放期间的中国经济高速增长, 与同一时期发生的人口转变密切相关, 或者说, 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源泉直接来自人口红利。运用人口学、经济学和社会学多视角观察, 可以发现人口变化通常表现为三种形式, 分别为人口的自然变化、机械变化和社会变化。这些人口变化形式在不断受到经济社会发展结果影响的同时, 也分别以种种方式反作用于经济社会发展过程。

许多学者用特定时期形成的人口特征, 如人口抚养比处于较低水平且处于持续下降过程的表现, 并将其纳入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 以解释人口因素如何促进经济增长。在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内形成了人口红利理论。<sup>[1]</sup> 也可以说, 这种研究关注的是由人口自然变化及其特质产生的经济增长结果。这种分析方法也被用于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研究。根据早期开创性学者常常采用的方法, 一些中国问题研究者把抚养比作为一个变量纳入计量模型, 得出其对改革开放期间经济增长产生正面促进效果的结论。例如, 王丰和梅森( Andrew Mason) 以人口抚养比作为人口红利的代理指标, 估计出在 1982—2000 年期间, 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为 15%。<sup>[2]</sup> 蔡昉和王德文的估计显示, 同一时期抚养比下降对人均 GDP

---

作者简介: 蔡 昉,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研究员。

增长的贡献高达 26.8%。<sup>[3]</sup>也有研究从更为广义的范畴定义人口红利,着眼于人口因素对生产函数中诸多变量的影响,观察人口红利的作用。在从经验角度分解经济增长的各因素之后,研究者对代表这些因素的各主要变量做出解释,发现其均直接或间接地与人口因素相关。<sup>[4]</sup>例如,资本积累的贡献与人口抚养比低带来的高储蓄率及劳动力无限供给带来的高回报率相关;劳动力数量和人力资本贡献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持续增长相关;全要素生产率或劳动生产率的贡献与劳动力在部门间和地区间转移产生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相关。<sup>[5]</sup>很显然,这里所指的资源重新配置过程,在现实中的表现就是人口的机械变化,即劳动力流动或人口迁移。然而,从社会学角度认识人口变化,或者反过来说,把社会性流动与人口因素结合分析的文献,迄今为止尚不多见。人口的社会性流动是相对于迁移等横向流动而言,是人口在攀登职业、收入、社会身份等社会阶梯方面发生的纵向流动。正如人口自然变化已经从人口学视角拓展到经济学视角、人口机械变化日益具有了多学科的维度一样,人口社会变化也不仅是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特别是,社会性流动是过去改革开放发展成果得以广泛分享的关键,因此这也将是检验高质量发展成败的重要评判依据。

由于发展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变迁相互影响、彼此促进的过程,因此,产生对经济增长正面推动效应的人口因素,同时具有对社会变迁的正面推动效应。换言之,人口红利既有其经济含义,也有其社会含义。本文把人口变化的自然、机械和社会三个维度结合起来,观察和理解改革开放以来高速增长经济增长成果如何分享,揭示人口转变和经济发展阶段变化如何对社会性流动提出新的挑战,分析高质量发展与社会性流动的关系,并从破解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取舍”难题,以及从把握好保障民生尽力而为和量力而行之间的动态平衡等角度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 二、人口变化的社会经济视角

改革开放以来,无论透过人口的自然变化、机械变化还是社会变化,都可以从中理解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同时,分别从不同视角进行观察,也能帮助我们理解中国创造两大奇迹的经济社会原理和具体机制。

### (一) 人口的自然变化

人口的自然变化,即人口学意义上的人口转变过程。作为一般规律,一个国家完整地完人口转变,通常要依次经历三个阶段:第一,在人均收入较低的发展阶段上,人口类型表现为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特征;第二,随着收入水平提高,人口类型表现为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的特征;第三,在更高的发展阶段上,人口类型呈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特征。简而言之,经历这些阶段实现从高生育率到低生育率的转变,就是作为人口学研究对象的人口转变过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结束了长期战乱及其造成的民不聊生状况,人民实现了安居乐业,人口死亡率迅速大幅度下降。同时,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之前,人口出生率的下降相对滞后,导致人口自然增长率上升。随后,在整个 70 年代死亡率继续下降但略微趋缓的同时,出生率开始大幅度下降,导致 1970 年人口自然增长率比 1949 年低了 1 个百分点。之后死亡率基本稳定,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在 80 年代有所上升。自 1998 年以后,人口自然增长率便一直低于 10‰,2004 年以来进一步降到 6‰以下,2018 年仅为 3.8‰。

在中国完成这样一个完整的人口转变过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第一,中国拥有世界 1/5 的人口,因而其所经历的这个过程,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转变。第二,中国的完整人口转变也是人类有史以来完成速度最快的。正如学者的比较显示,英国和法国的总和生育率从 5 降到更替水平 2 左右,共经历约 75 年的时间。而从中国的数据看,同样幅度的生育率下降仅用了 20 年的时间。第三,快速的人口转变使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特征得以充分表现,形成在 1980—2010 年期间,劳动年龄人口高速增长和人口抚养比持续下降的态势,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了独特的人口红利。

## (二) 人口的机械变化

人口的机械变化,即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地域之间和产业之间的大规模流动。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人民公社体制、户籍制度和票证制度“三驾马车”,严格限制农村劳动力进行产业转移和地域流动。在改革期间,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改革释放出农民的劳动生产积极性,剩余劳动力被显现出来。与此同时,经济高速增长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通过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拆除一系列制度障碍,使劳动者能够依据就业机会和相对收入的市场信号,离开原来所在的低生产率就业领域,在地域上和产业间流动,并进入新的、生产率更高的就业领域,形成人类在和平时期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

在2000—2018年期间,离开户籍所在乡镇外出打工的农村劳动力(即农民工),从7800余万人增长到1.73亿人,年平均增长速度为4.5%。这个速度甚至显著快于城镇总就业的扩大速度(年平均3.6%)。由于这里定义的农民工有78.2%进入城镇就业,农民工增长速度快于城镇就业增长速度的现象,便显示出人口机械变化的本来含义。也就是说,从农业中转移出来的人口,为城市非农产业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人力资本、投资高回报的条件和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因此,这个过程成为改革开放期间经济发展的重要且不可或缺的部分。

## (三) 人口的社会变化

人口的社会变化,即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在代际或队列间的变化。在计划经济时期,人口迁移和劳动力流动被严格限制在集中计划范围内,人们只能通过统一招工、高等学校毕业分配和部队复员转业,才能实现在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横向流动,获得职业变化、收入群体地位变化,从而实现社会身份改变。改革开放以来,高速增长和产业结构变化,为城乡居民创造了更多的经济机会,加上通过旨在清除制度性障碍的一系列改革,人们获得了更多的社会通道,通过人口流动进行横向的职业选择,纵向流动的通道也相应得以疏通。特别是,随着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扩大招生为主要推动力的教育发展,人们主要通过职业阶梯的攀升及创业,得以改变自己及其父辈所属的收入组地位。

限于数据可得性,仅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和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以教育发展和职业地位变化为例,认识这个人口转变时期的社会性流动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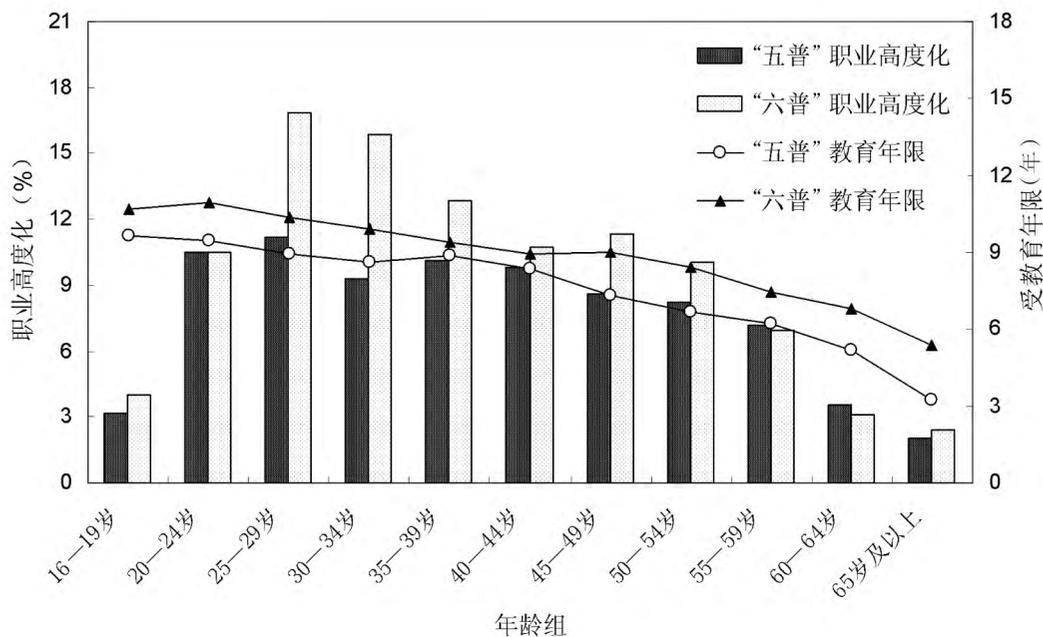


图1 受教育年限和职业高度化指数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http://www.stats.gov.cn/tjsj/pcsj/>。

通过两个指标来观察。第一是分年龄组的受教育年限。根据人口普查数据中分年龄组的受教育阶段,分别赋予各组的受教育年限,即“未上过学”为0年,小学为6年,初中为9年,高中为12年,大学专科为15年,大学本科为16年,研究生为19.3年(按硕士生和博士生人数的加权平均值计算)。第二是分年龄组的职业高度化指数。计算每个年龄组人群中职业被定义为“专业技术人员”与“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两部分人员的合计占全部就业人员的比重。(见图1)

从图1所示的两个指标来看,首先,十年间受教育程度和职业构成的变化,表现为人均受教育年限的显著提高,以及随着非农产业特别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扩大,更多的“白领岗位”被创造出来,职业高度化程度整体得到提高;其次,在同一时点上,受教育程度和职业构成的年龄分布,即劳动年龄人口的人力资本禀赋从20—24岁的最高点,随着年龄增长而降低,而职业高度化指数在30岁前后达到最高点,随后也趋于降低;最后,受教育水平与职业高度化之间的关系,总体来看,劳动者受教育程度提高,既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从而职业高度化,也是对产业结构调整对人力资本需求的积极反应。

### 三、社会性流动的两种模式

在不同的人口转变时期及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社会性流动以不同的模式发生,模式之间具有巨大的差异性,并可能形成不尽相同的变化特征,进而导致大相径庭的社会经济后果。因社会流动性减弱而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并且固化这种差距,进而造成政治分化和社会分裂,是当今世界普遍存在的现象,发生在不同类型的国家。从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中,可以做出一些抽象概括,以便从理论层面上回答,在何种情况下社会流动性较强,以及在何种情况下社会流动性减弱等问题,有助于中国在保持和增强社会性流动的努力中借鉴。根据人口转变阶段因而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可把社会性流动划分为两种模式。

#### (一) 具有“帕累托改进”性质的纵向社会性流动

在特定的人口转变阶段上,人口因素有利于经济增长。这种潜在的人口红利,通过劳动力充足供给和人力资本的快速改善、高储蓄率和高投资回报率,以及资源重新配置引致的生产率提高,实际推动高速增长和产业结构变化。这个过程为各类劳动者提供了大量的机会:一方面,实现就业类型的转换,如从生产率低的农业等传统产业,转移到生产率更高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另一方面,伴随着新成长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劳动者具有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相匹配的职业技能和就业能力,得以抓住多种机会沿着岗位阶梯提升自己的职业高度,进而带动家庭收入地位的提高。

由于在这个发展阶段上存在着大量的社会性流动机会,使得更多的个人和家庭能够提高自身的职业高度、收入地位和社会身份,实现向上的纵向社会性流动。与此同时,这个向上的流动却无须以其他个人和家庭的向下流动为条件。因此,这种类型的社会性流动具有“帕累托改进”的性质。这正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际经历的过程。实际上,图1所显示的人均受教育年限与职业高度化的同时提高,就揭示了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社会性流动就具有这种特质。由于高速增长和社会性流动同时发生,城乡居民得以在改革开放发展中广泛获益。

#### (二) 具有零和博弈性质的社会性流动

在进入新的人口转变阶段和经济发展阶段的情况下,有利于高速增长和生产率提高的人口因素趋于式微,也就意味着人口红利的消失。这时,在经济总量扩大和产业结构变化都明显趋缓的情况下,较高的职业位置、收入组别基本保持不变,从而社会分层趋于“饱和”,社会流动似乎只能以有赢即有输的方式进行,即一些群体在社会阶梯上的向上流动,可能伴随着另一些群体在社会阶梯上的下滑,这“一上一下”便成为社会流动性变化这枚硬币的两面,彼此互为因果。这里似乎产生了一个社会流动的“合成悖论”。在更为高度化的职业位置有限且变化甚微的情况下,每个家庭都力争上游,即处于更高职业位置的群体力图保持既有格局,而处于较低职业位置的群体希望打破现状,使得职业高度变化成为一种双向流动。由此也诱致出一系列派生结果,如收入地位形成有升有降格局,人们在社会阶梯上也不再是人人向上,而是有上有下。按照性质,这种模式的社会性流动更接近于一种零和博弈。

在中国劳动年龄人口于 2010 年达到峰值、人口抚养比触及谷底后,人口红利已经加快消失,分别从劳动力供给不足、人力资本改善速度放慢、资本回报率下降、资源重新配置空间缩小等方面,降低了 GDP 的潜在增长率,并实际表现为经济增长的减速。由此带来的社会性流动机会萎缩的现实,可以从收入差距呈现再次扩大的端倪中观察到。例如,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在 2009 年出现降低的趋势后,于 2016 年开始不再降低。此外,观察图 2 中的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五个分组,可以看到,虽然各收入组都经历了平均收入的增长,但是,近年来较低收入组的收入增长速度慢于较高收入组的趋势日益明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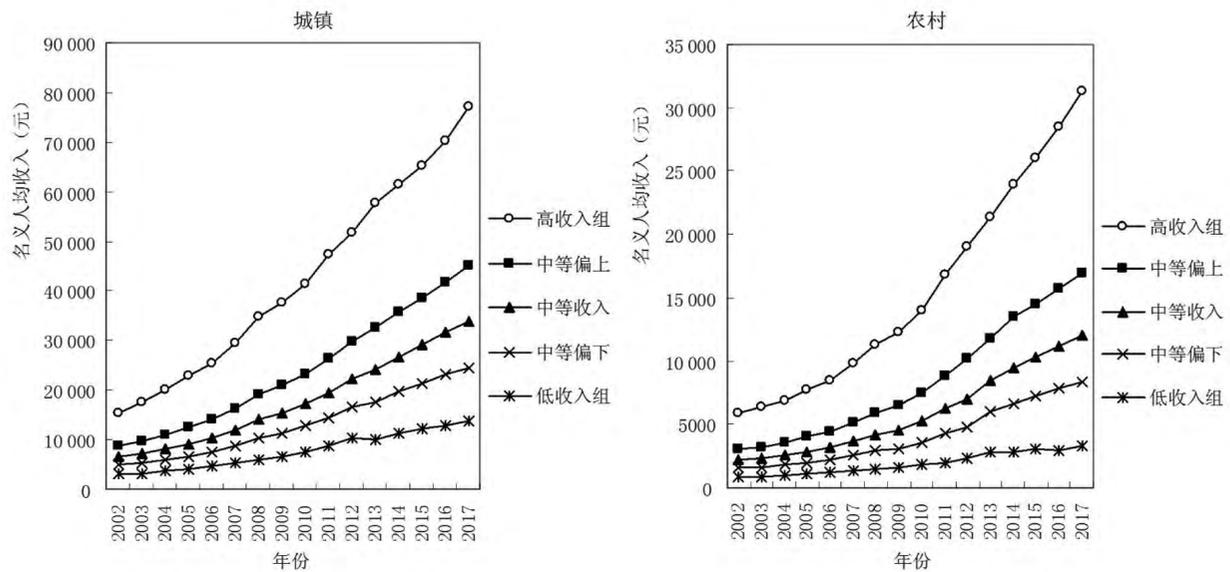


图 2 城乡居民五等份收入组的收入增长趋势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http://www.stats.gov.cn/>; 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随着劳动力短缺现象的出现,劳动密集型产业加快丧失比较优势,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于 2006 年开始下降。从国际比较来看,这个比重的下降明显早于发展阶段的要求。相应地,制造业比重下降导致就业结构的不利变化。职业高度化主要应该指在制造业内岗位的高度化,即更多职工有机会上升到专业技术工作岗位上。事实上,在图 1 中做出 2000—2010 年期间职业高度化趋势比较的基础上,可以看到,在那之后情况发生了新的变化。例如 2015 年 1% 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专业技术人员占就业人员比重的提升速度,开始明显慢于商业服务业人员比重的提升速度,而此一比重的上升并不意味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就无法支撑工资的持续合理上涨。

如果一个社会确乎形成这样一种社会流动悖论,从而使零和博弈大行其道的话,就有极大的可能导致收入差距扩大,进而引起社会各阶层的不满。一方面,处于社会流动阶梯下端的群体力图打破既有格局,往往会采取各种形式进行表达;另一方面,处于社会流动阶梯上端的群体形成更强的维护既得利益的动机,也会以某种方式表现出来,结果便会造成社会凝聚力的弱化和社会和谐程度的降低。这种情况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曾经发生过,甚至在不少国家正在发生。其中,中等收入国家特别是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更容易产生这种现象,并且常常会演变成严重的扰动事件。

中国于 2009 年跨入世界银行定义的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后,近年来,随着逐渐向高收入国家行列靠拢,经济增长也因人口红利消失而出现减速的长期趋势。鉴于此,国际经济学界提出的一个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命题,<sup>[6]</sup>引起国内的热议讨论。在这个讨论中,一般而言,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绩效的关系,或者特别而言,是收入差距过大导致经济增长停滞,还是经济增长停滞造成收入差距扩大的结果,或者是否两者之间互为因果,成为一个旷日持久、莫衷一是的争论话题。

各个国家在不同时期的实践分别具有独特性,依据此时此地或者彼时彼地的经验所形成的特征化事实,都不足以获得一般性的结论。即便有些研究尝试做出某些判断,也难以在所有研究者中获得共识,更不能以之作为认识事物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准则。不过,仍然可以从各种现象之中,观察到收入差距与增长绩效之间至少存在着某种并存关系。由于以前的研究表明,特定的经济增长表现与发展阶段特征是相关的,因此,可以预期看到收入分配状况与发展阶段变化之间的联系。

在图3中,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整体观察158个国家人均GDP(反映发展阶段特征)与基尼系数(反映收入分配状况)之间的关系。以40%的基尼系数作为分界点,以此区分收入分配“较好”(小于40%)或“较差”(大于40%)两种状况。从中可以大体看到的一个统计趋势是:人均GDP在12 235美元以上的高收入国家,大多数分布在较小基尼系数的区间;同时,有些人均收入在1006—12 235美元之间的中等收入国家,以及人均收入在1005美元以下的低收入国家也多处于这个较小基尼系数区间;然而,在较大基尼系数的区间中,分布的绝大多数为中等收入国家。可见,无论因果关系如何,“中等收入陷阱”与收入分配恶化具有密切的相关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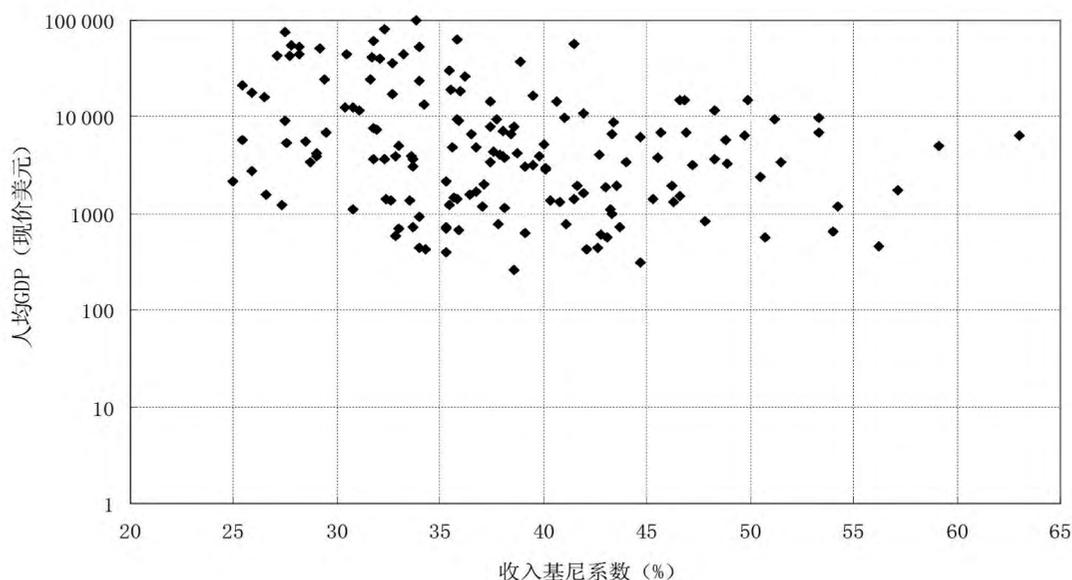


图3 收入分配状况与经济发展阶段

资料来源: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世界银行官方网站 <https://data.worldbank.org/>。

注: 纵坐标取对数刻度。

在中等偏上收入发展阶段上,国家倾向于在既往的经济增长速度基础上,发生显著的减速现象。<sup>①</sup>不仅如此,在跨入世界银行关于中等收入国家与高收入国家划分的收入门槛后,经济增长明显减速甚至陷入长期停滞的情形也不乏其例。以往的许多研究探索了这种减速现象的原因,<sup>[7]</sup>这里值得关注的是,中等偏上收入这个发展阶段,恰好也是社会性流动倾向于从第一种模式转向第二种模式的时间区间。如果不能解决好社会性流动趋于零和博弈的问题,收入分配状况恶化就会作为结果表现出来。

#### 四、高质量发展与社会性流动

在中等偏上收入阶段乃至刚刚跨入高收入门槛之时,经济增长遭遇减速是正常的,并不意味着处在

<sup>①</sup> 参见: Barry Eichengreen, Donghyun Park, Kwanho Shin. When Fast Growing Economies Slow Down: International Evidence and Implications for China, NBER Working Paper, No. 16919, 2011; Barry Eichengreen, Donghyun Park, Kwanho Shin. Growth Slowdowns Redux: New Evidence on the Middle-income Trap, NBER Working Paper, No. 18673, 2013。

这个阶段的国家必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在这个发展阶段,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与较早阶段摆脱低收入陷阱并在中等收入阶段保持高速增长的源泉是不一样的。如果说早期的增长主要来自生产要素积累的贡献,生产率的提高主要得益于资源重新配置效应的话,在更高的发展阶段实现高质量发展,则越来越依赖于创新驱动的生产率提高。不仅如此,高质量发展还要求做到发展目的与发展手段的有机结合。

高质量发展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也需要处理好尽力而为和量力而行之间的关系。在经济学的传统思维中,效率与公平往往被视为一对此消彼长的关系,因而需要做出取舍的矛盾。例如,美国经济学家奥肯(Arthur M. Okun)在其1975年出版的著作中,就把公平与效率关系阐述为一个非此即彼、此消彼长,从而需要在不可兼得的鱼和熊掌之间进行权衡取舍的大问题。<sup>[8]</sup>基于这个理念,许多国家在政策制定中,也不能保持尽力而为和量力而行之间的平衡。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许多国家的政府在政策制定和实施中,经常性地处于忽左忽右、摇摆不定的状态。例如,很多国家在过去几十年受到新自由主义“涓流经济学”的影响,坚信市场机制可以自动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因而忽视对普通劳动者权益的保护和对低收入家庭的社会保障,最终造成贫富两极分化和中产阶级萎缩。由于没有认识到或者不愿意承认问题产生的根源,一些政治家为了争取选票,把自身的问题归咎于经济全球化及其他国家的发展,以至近年来在许多国家,各种版本的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思潮纷纷涌现,最终相应的政策措施终究也只能产生南辕北辙的效果。这些现象都证明,在理念上把效率与公平看作是对立的,必然导致实践中的两难抉择,无法形成尽力而为和量力而行的良性平衡。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持和扩大社会性流动,是破解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取舍”难题,保持尽力而为和量力而行之间动态平衡的关键。一方面,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和建设,充分畅通社会性流动的渠道,使社会上的每一个人和每一个群体,都感觉上升有希望,前行有奔头;另一方面,保持市场配置资源的激励机制,鼓励人人通过自身努力,在公平竞争的环境中创业就业,提高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以下,我们从目的论和手段论相结合的角度,简述通过制度建设和体制改革促进社会性流动的几个关键方面。

首先,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加大政府再分配和社会保障力度。这一制度需求主要产生于两个因素。一方面,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各类市场主体都需要面对创造性破坏,以保持生产率的持续提高。随着农业中剩余劳动力的减少,大规模劳动力流动带来的资源重新配置效应不再像以往那样明显,生产率的提高越来越依赖市场主体的创新。从经济学家熊彼特的论述和国际经验来看,创新是一个市场主体有进有退、有生有死的优胜劣汰过程,因而创造性破坏是实现创新的基本机制。<sup>①</sup>许多国家的经验也表明,只有社会保障网足够牢固并且充分覆盖,对那些受到影响的劳动者个人实施尽可能充分的社会保护,市场主体才能义无反顾地进行创新,社会也才能经受得住与创造性破坏相伴的成长中的烦恼。另一方面,如前所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到了这样的阶段,社会性流动倾向于具有零和博弈的性质。创新发展需要允许个体的失败,同时又不能对个人和群体的基本生活造成伤害。这时,保持充分的社会性流动,就要做到既在微观层面激励人人向上,同时也在社会层面对潜在的受损群体给予政策托底。

其次,教育深化和均等化是疏通社会性流动通道的根本途径。固然,让全体人民接受更多的教育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所在,教育还是一个社会在更高发展阶段持续发展的驱动力,是保持社会流动性的润滑剂。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两大国际环境,分别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新一轮全球化,国家竞争力有赖于全民人力资本的整体提升。当前,中国教育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

<sup>①</sup> 参见:[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对于利润、资本、信贷和经济周期的考察》,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美]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

突破资源约束,实现教育优先发展。应对挑战的举措应该是双重的:一是坚持市场配置资源的改革,提高人力资本回报率,激励个人和家庭对教育进行投资;二是加大政府公共投入,从具有最高社会回报率的儿童早期发展和学前教育入手,推动教育深化和均等化,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促进公平合理的社会性流动。

最后,通过深化改革消除不利于社会性流动的各种制度性障碍。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破除妨碍劳动力、人才社会性流动的体制机制弊端。”在现行经济体制和社会政策中,的确存在着这种阻碍社会性流动的障碍因素,需要通过制度建设和深化改革予以破除。例如,户籍制度的存在及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不均等性,仍然构成人口和劳动力横向流动的障碍,而充分的横向流动是纵向流动的必要前提。人们只有在具有对于永久居住地、期望职业、创业机会及基本公共服务的完全获得权和选择权之后,才能真正获得社会性流动的平等机会。因此,通过深化体制改革、完善社会政策托底,让每个社会成员站在相同的起跑线,社会性流动仍然可以最大限度地成为正和博弈过程。

参考文献:

- [1] Jeffrey G. . Williamson. Growth ,Distribution ,and Demography: Some Lessons from History [J].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1998 (3) .
- [2] Wang F. ,Mason A. . The demographic factor in China's transition [J]. Journal of the Japan Research Association for textile end - uses , 2008 ,42: 55 - 66.
- [3] Cai Fang ,Wang Dewen. Demographic transition: implications for growth [A]. Garnaut , Ross , Ligang Song ( eds) The China Boom and Its Discontents [C]. Canberra: Asia Pacific Press 2006.
- [4] Fang C. ,Wen Z. . When Demographic Dividend Disappears: Growth Sustainability of China [M] // The Chinese Economy. Palgrave Macmillan UK ,2012.
- [5] 蔡 昉. 中国经济改革效应分析——劳动力重新配置的视角 [J]. 经济研究 2017( 7) : 4 - 17.
- [6] 印德尔米特·吉尔·霍米·卡拉斯. 东亚复兴: 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 [M]. 黄志强,余 江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8.
- [7] 蔡 昉. 从中等收入陷阱到门槛效应 [J]. 经济学动态 2019( 11) : 1 - 12.
- [8] Okun A. M. . Equality and Efficiency: The Big Tradeoff [J].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 1975( 3) .

(责任编辑:金光敏)

## How will China Maintain Social Mobility in the Phase of High - Quality Development

Cai Fang

(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 Beijing 100732)

**Abstract:** China has not only created an economic growth miracle , but also created a social stability miracle , thanks to the active social mobility in the reform period. As China enters the new stages of demographic transi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 it is a challenging task to maintain social mobility given that social mobility at such stages tend to potentially have a zero - sum game nature. Soundly tackling such a challenge is vital for China to continue to share the outcome of reform , opening , and growth among all groups of people , and therefore to help avoid the middle - income trap. Based on the analysi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and social mobility and aimed to break the tradeoff between efficiency and equity in development , the paper provides policy suggestions , including strengthening government redistribution , deepening and equalizing education , and eliminating institutional obstacles deterring social mobility.

**Keywords:** High - Quality Development; Social Mobility; Redistribution

# 经济学人

马学军题



**蔡昉：**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研究员，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十四五”国家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长期从事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劳动经济学、人口经济学、中国经济改革与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和贫困等。发表《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中国经济改革效应分析——劳动力重新配置的视角》等学术论文数百篇；出版《从人口红利到改革红利》《四十不惑：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经验分享》等著作，并获中国出版政府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中华人口奖等奖项。

**马晓河：**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原副院长、研究员。中国城乡二元结构改革的推动者之一，也是新时期主张改革需要顶层设计的主要代表人物。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中国投资50人论坛、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成员。兼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改革和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国家行政学院兼职教授，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兼职教授，中国城镇化促进会副会长。多次参加党中央、国务院文件起草工作。发表论文300多篇，出版著作10多部。主要代表作：《改革需要顶层设计》《大转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



**卢现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财政部跨世纪学科带头人，湖北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获教育部2005年度“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资助。兼任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理事，湖北省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副会长，湖北省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数量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多篇，出版《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寻租经济学导论》《寻找一种好制度——卢现祥制度分析文选》等著作。承担多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和省部级课题，多项成果获得省部级奖励。

**荣兆梓：**安徽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常务理事、全国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史学会理事、安徽省经济学会常务理事等。曾任《江淮论坛》副主编、安徽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在《经济研究》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百余篇，成果获安徽省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二次、二等奖多次。著有《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通论》（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劳动平等论：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和《企业制度：公平与效率》（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等。

